

一得文丛

毕竟东流去



张罗 著

第三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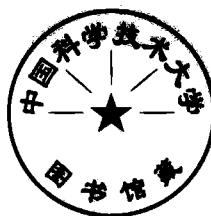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毕竟东流去

第三部 神州逐鹿

张罗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竟东流去/张 罗 著 . -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

2001.12

(一得文丛)

ISBN 7--104—01463—2

I. 毕… II. 张… III. 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N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5299 号

一得文丛·毕竟东流去(一、二、三) 张 罗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山东和平印刷厂 印刷

9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40.75 印张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 册

ISBN 7—104—01463—2/J · 633 定价: 60. 00 元

导 读

人的记忆像是深山里的泉水，细细流淌着，有的流过小溪归向大海；有的则如絮语，潺潺流过，留在根土间，滋漫着记忆中的绿叶；有的则如同飞瀑，呼啸而下，绕过顽石，澎湃在心灵的长河中，铭记一生。

我的小说，从这里开始已进入最后一部了。也不知它在你的记忆中留下几片碎叶。但不管你是否已记下了他们斗争历程中的某些片断，我的主人公在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，备尝了抗日战争的风霜雨雪之后，现在又回到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故乡了。在以往的八年离乱中，我的主人公从北平的学生运动中走出来，经过“七·七事变”、“淞沪抗战”和“台儿庄大战”，备尝了民族衰弱和战事失利的痛苦，在武汉大会战后，流浪到了陪都雾重庆。主人公钱寒涛和郁丹兰在各自经历了痛苦的分离，并在野人山“系铃人解铃”之后，再次重逢，重又感受到那一世难解的情爱的痛楚，然而冰雪已开始消融。那匆匆而来，又匆匆而去的华侨小姐丛雁飞，这时无可奈何花落去，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。神秘人物唐继汉，在野人山突然撩开面纱，显出地下党员的本色，那个令钱寒涛揪心不止的、神秘难忘的青岛之夜的哑谜终于解开了；文弱书生吴近越，这时已悄悄地走过虎啸口和上清寺，在巴

山蜀水间埋葬好亡妻之后，也扶棹东下，回到了上海。我的主人公们，洗去了身上的尘埃，都要开始新的战斗生活了。

八年了！人民经过漫长的国土沦丧的八年，希望和平，希望从此开始建设积弱的国家。但是，人们并未享受到这一切。他们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，内战的乌云就已盖过了神州上空。我的主人公还来不及洗去征尘，就逼着他们风雨兼程不得不又投入新的战斗。

在《神州逐鹿》这部小说里，我的这几位主人公，有的回到学校；有的在兵刃相见的前线；有的则仍在新闻战线上，忘我地从事着战斗。特别被毛主席称为第二战线的学生运动中，他们废寝忘食地巧妙奋战，终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昆明西南联大的“一二·一运动”，驻北平美军强奸北大学生的沈崇事件，沪宁等地掀起的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的“五·二〇”运动，他们又亲自经历了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斗争过程。他们是那一代革命者从事巧妙曲折的地下斗争的历史见证人。最后，我的笔下的主人公，又都纷纷回到了北平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他们把自己宝贵的青春，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祖国的解放事业。

历史是一面永恒的无情之镜，任凭岁月风雨的吹打，从不扭裂。当然，有时它也会暂时被埋在地下，但总有一天它是会被人们挖掘出来的，或许也因此会成为历史文物。小说中的那些故事，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但在后人看来，它依旧是那样鲜艳夺目光彩照人，使人难以忘怀。我的小说《毕竟东流去》，如能抚摸一下这面历史之镜，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满足了。

“于今腐草无萤火，终古垂杨有暮鸦！”“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”，小说中所涉及的历史际遇，就只好留待后人评说了。

第二十七章

一九四五年秋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，黄浦江，外滩。

江上晨雾弥漫，外滩对面的浦东隐隐约约地深藏在一片浓雾之中。江上大大小小的轮舰，不时发出呜呜的笛鸣，在大雾中互相呼应着，避免冲撞，徐徐穿浪而过。浊浪拍打着岸边的大堤，时不时地发出刷刷地拍打声。从远处漂游过来的废纸碎片，随波逐浪，晃着身子，飘然而去。偶尔，还有贴着日本女郎的日本商标和广告画片，在浊浪中摇晃着向人们展开微笑。浑水还不时地卷着印有美国 U S A 标志的罐头空盒，郎当作响，碰撞着堤岸。抗战胜利了，像潮水一样的美国货，迅速地涌进上海滩。货架上原来的日本货，像一下被夜空吞没了似的，一夜之间消失了。那些张贴在橱窗上的巨幅的五光十色广告招牌，像被一阵狂风刮走，一下全都在街头消失。有的被焚烧，有的被人踩在脚下，有的被丢进江里，随着苏州河的浑浊河水和黄浦江的大浪，飘向东海，消失在滔天的海浪之中。

外滩依然是繁华的。那些沿外滩的高楼大厦依然虎视眈眈，矗立在那里。这些尖拱式的，极富于殖民色彩，充分显示维多利亚风格的高楼大厦，现在依然傲视着它脚下的人们。那在夜间闪烁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华丽景色，好像要叫人赶快忘记那八年抗战给你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。

他站在堤岸边，靠着护堤墙，不时地用目光扫着周围的人群。

忽然，他听见不远处有人喊叫声：

“救人呐！救人哪！有人跳江了！！”

他急忙奔了过去。这时，只见一个已经停止呼吸的中年人，已被一个中年模样的工人从江里救了上来。四周正围过来一群人，发出各种议论和猜测：

“是汉奸，怕杀头，畏罪自杀的吧！？”

“也不像是情杀……”

……

“喔！我知道了，是他，是他，是霞飞路上一家商店的老板。”

人群中挤过来一个上了年纪穿戴入时的妇女说。显然，她认识这个投江者：“前几天就听说了：胜利后，他由于货物脱手，没有及时进货，结果，家里只剩下了一堆伪法币。一夜之间商店破产；债主又不断逼上门来，看来，在绝望中，只能用投江来了此残生了……”

很显然，她熟悉死者的情况，她边叹息，边麻木地离去。随后，一名值勤的警察走了过来，在死者的身上盖了一张破席，缓步离去。外滩重又繁忙地驱动起来。它像一条由车子和人流混合成的轮带，又在不停地无休止地滚动着，喧嚣着。

他回到了原地，望着江水，深锁着双眉，似在审视着什么。他的手里，拿着一本原版的《Gone With The Wind》，像是在看，又像在沉思。不一会儿他又走到了另一边，望着滚滚而去的江水，看着那原来满装着食品和救济物资的美国货轮，现已被改装成运载美国军用物资和国军士兵的军舰了。那标志着美军军用武器的巨大箱体，正从对岸的浦东卸下。船上，岸上，已密密麻麻地布着守卫在它四周的国民党士兵和武装美军。

他转过身去，把目光投在那背后矗立着的沙逊饭店，一种被污辱了的耻辱感立即涌上了他的心头。想当年，这个沙逊饭店的老板是多么狂妄！这个犹太人凭借着帝国主义的特权，硬是要毗邻的

我国中央银行大楼比它矮一公尺。这就是我们国家贫穷软弱的印记呀！

他站在那里正在这样想，忽然看到从沙逊饭店的门口走出一对衣冠楚楚的男女，双双都戴着一副颇为神秘的墨镜。那女的依偎在年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身旁。他们款款朝江边走来，旁若无人地从他的身边走过，颇为不屑一顾地看了看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那本《Gone With The Wind》，又朝南走去。他们经过一个花坛，那女的朝站在不远处的一个人点了点头，于是那个人马上朝她驶过来一辆雪佛莱小车。她没有进去，却忽然朝那个青年走了过来。待到她走近他时，她才摘下墨镜，把手中的一本《双城记》朝这位青年前一晃。那青年见到她后，不觉心中一喜。于是，立即跟着对方走了过去。正在这时，那辆崭新的小卧车，刷地一下驶到了他俩身旁。司机迅速把车门打开，两人立即钻进了小车。

这时，只见刚才从沙逊饭店门口与这位姑娘一起出来的那位中年人，正坐在小卧车的后座。见了他钻进车内，马上向他伸出手来，并轻轻地说：“寒涛同志，你辛苦了！”说毕，立即给他让开一个座位。小车司机还未等他把话说完，就迅即把车向南京路急驰而去。

“我们昨天就在沙逊饭店七楼租了一间临江的房间。”那位中年人在车内继续朝钱寒涛微笑着说。他坐在钱寒涛的旁边。那位姑娘则坐在前面司机旁的座位上。她身着艳装，抹着口红，披着一头烫发，嘻笑着坐在前面，像似一位颇惹人注目的官家小姐：“我们在沙逊饭店楼上，确信你无人盯梢时，才开始走了下来。这就难为你多等了一刻钟，寒涛同志！”她一边说着，小车就已穿过南京路——大世界，小卧车一直向西郊风驰电掣般的驶去。

不久，小卧车在西郊一个别墅式的小花园前停了下来。此地，四周视野宽广，周围竹林密盖，既幽静又安全。

“没有想到吧，我们要挑这么个地方来见面。这是一个很安全

的地方。主人现在还在重庆。”对方用手示意一下请钱寒涛在一张沙发上坐下，然后亲切地说：“你的关系已从南方局转到了上海市文委，寒涛同志。今后，你与文委的联系就由小许负责。组织上有什么事她会通知你的。”

一阵兴奋，在钱寒涛身上涌起。在离开重庆之后，由于一时未与党取得联系，自己对不少问题已感到捉摸不定，甚至有些迷惘了。

“文委的意见是，你在上海依旧是独立作战。当然你不是孤立的，在你的周围有我们自己的不少同志。具体有什么打算，我们想先听听你自己的意见。”

钱寒涛这时发现，对方的年纪比自己要大，显然在党内这是一位老同志。他容光焕发，眼睛灼灼有神，却又显得非常亲切。他操着上海本地方言，像是对寒涛在问：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我能帮助些什么？

“目前我最大的困难是对时局的把握。”钱寒涛思忖了一下之后说。“脱离了党的领导，很难一下把握住形势的脉搏。”他感到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疑虑：抗战胜利来临的同时，另一场战争的阴云，已开始在国内密布。但他对此毫无把握，更缺乏自信，因为他对形势知道得太少了。

“也好，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形势也好。”这位文委的领导同志叹了一口气，深沉地说。看得出来，他对这个问题是常在研究胸有成竹的。“在四至六月间召开的我党六次代表大会，规定了党的总路线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‘放手发动群众，壮大人民的力量，在我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，建设新中国’的总路线，同时，还提出在国内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。党中央又作出了《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》。‘要全党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……猛力扩大解放区，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，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发动武装基本群

众，不应稍有犹豫。”

这位文委的领导同志强调，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。于是他根据这个中心内容，向钱寒涛扼要地介绍了多方形势。

首先是我党领导的各解放区，迅速将部队集中脱离分散的游击状态，组成正规兵团，集中行动，以便在解决敌伪时，保证我军取得胜利。

“当然，蒋介石是不会同意我们党的总路线的。毛泽东同志说：抗战时蒋介石在峨嵋山，现在，他要下山来摘桃子了。”于是，他具体列举了那些像在他的脑子里思考了多遍，已是熟透了的军事态势。

日本投降后，蒋介石接连发出了四道命令。第一道命令，要原来躲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加紧开拔，由美国负责交通工具，火速进军，把被我八路军和游击队包围的伪军火速解决掉。第二道命令，就是命令伪军驻守原地，向他蒋介石军队投降，不能向我八路军或游击队投降，并要他们负责当地治安。第三道命令，是命令我十八集团军原地不动，不准受降。

“至于那第四道命令，那就更荒唐了，”这位文委的负责人用上海方言轻蔑地说。“那就是他命令日本的冈村宁次不仅在接受投降前，要负责原地防务，而且如果被我们的军队占领，还命令他要负责将其收回。你在上海该看到了吧？！仅仅由于蒋介石的第二道命令，国民党就把在抗战中投降日本鬼子的六十七名降将和七十八万军队，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国军。”

这使钱寒涛一下明白了过来。因为他在从重庆回到上海时，大汉奸头头周佛海和罗君强就被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；任援道为先遣军总司令。现在，经地下党这么一点，他立即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，对付共产党，蒋介石是可以不顾一切面子，扯下脸面，公开与日伪合流来对付我们的。钱寒涛本来游移不定的思想，这时一下明朗了起来。

“我们的党当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，由于解放区形势的胜利发展，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坐下来和我党谈判。”

“关于谈判，”钱寒涛这时不禁插了一句。“我们报社内部议论不少；前方战事似乎还非常激烈。打打停停，停停打打，许多人似乎都感到凶多吉少！”

“它说明蒋介石并不想和平，想独占胜利果实。只不过他现在还在四川，他的部队还在内地，还来不及运到前线而已。一旦准备就绪，就会大开杀戒。当然，由于朝野的努力，加上我们党不屈的斗争，也有可能暂时能争取一个和平协定的签订，那也是我们党所希望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两手准备。我们党有过教训了，对蒋介石只准备一手不行；我们应该有两手，一手争取一个好前途，另一手准备一个坏的结果。因此，你的工作也需要围绕着这个总的形势来考虑。”

听完了对方详细的介绍，最后一涉及到自己工作，钱寒涛就沉思开了。他望了望正在门外来回走动，担任监视四周动静的小许姑娘，深深地呼吸一口气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有什么困难吗，寒涛同志！”对方问。

钱寒涛苦笑了一下，最后，终于迎着对方扫过来的探询的目光，鼓起了勇气说：

“别的困难现在还没有估计到，只是自己还有一个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？”

“别的想法倒没有，”钱寒涛这时颇有些难色：“我想离开《大公报》，最好到根据地去，譬如说，到苏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对方微笑着问。

“一来是，我在《大公报》的时间太长了，二来吗——我总感到《大公报》的倾向现在越来越向右了。我在那里感到十分别扭。”

“说得具体一点好吗？”

“我是说它越来越亲国民党了。”

“《大公报》原来不就是对国民党‘小骂大帮忙’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它一向标榜自己是不私、不盲、不党、不卖，可它在内部却早就不是那样了！”

“它不是支持过你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吗？”对方依旧是笑眯眯地问。“你这个《大公报》的笔杆子，不是依旧被《大公报》视为一种骄傲，是它的一个有影响的名记者吗？”

“可我最近看它的言论越来越离‘不党、不卖’更远了。至于它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，而且现在仍寄希望于我，其中有些什么原因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不错，《大公报》在全国确有几个有影响的记者，然而据我私下所知，现在这些人有不少是想离开的。我自己的想法是，晚脱离不如早脱离。退一步，如果不能到苏北，自立门户也比在那里强。我可以脱离它，自己来开辟一个天地的！”

钱寒涛不紧不慢地说着，显然他已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了。一说出来，他就感到一种已把闷在肚子里很久的一股粗气吐了出来，心里感到一阵舒坦。

“不对，寒涛同志！不是‘晚脱离不如早脱离’；而是能不脱离绝对不脱离。《大公报》在全国有不少影响。尤其像你这样的在全国有影响的记者，是代表着《大公报》的一个群体。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笔杆子来影响它、利用它。目前看来，《大公报》的言论有不少偏斜，将来也可能会更偏斜，因为它是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办的报纸吗。尤其它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，它与国民党的政学系又有那么多瓜葛，那么深的关系。要它办报保持中立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它还不像是国民党的《中央日报》吗？！它在市民中、学生中、官僚中，总还要装成有某种独立性吗！这是它欺骗性的一面；因此也就有可以被我们利用的一面。我们就要利用它欺骗性的一面，来宣传我们党的真理，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黑暗。所以，我们应该坚持住这块阵地，绝不主动撤离。更不是撤退，而是

要千方百计地站稳脚跟！”这位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越说越激动，以至于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平息一下情绪，就站了起来转了几步，然后，走到寒涛的身边椅子上坐下来，弯下腰来轻轻地对他说：“至于自立门户吗，我们会另想办法的。如果你有什么文章不便在、或者不能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，则可以交给小许转过来，我们会找刊物给你发表的。”

这是一席颇为严肃的话，像一个个钉子一样，每一句话都使钱寒涛无法有半点犹豫或产生动摇。他无话可说了。

见到钱寒涛不再吭声，这位老同志略一思索不觉又站了起来，颇为感触地说：“寒涛同志，记得刘禹锡的那首《再游玄都观》的诗吗？”

听对方这么一说，钱寒涛的眼睛不觉亮了一下。他马上感到对方肯定是一位颇有教养的同志。但是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就背诵开了：

“‘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’。对上海我们都不是新人了。我听说过抗战前，你在上海的《大公报》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这次回沪，也算是一个‘前度刘郎’了吧！？我呢，抗战前在交通大学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，随后，又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。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到了根据地。这次回到上海，重又投入新的战斗，我们不是撤退，而是挺进。为什么你却要想撤离呢？！再说小许吧。”他指了指一直在外边巡视的那位姑娘，朝寒涛说：“她原来是一位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富家小姐，抗战前原来在上海大西路金碧辉煌的光华大学念书，后来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，投奔到了苏北根据地。这次也一起和我回来了。既然我们在上海轻车熟路，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战斗下去？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是藏污纳垢、投机家冒险分子的乐园，但也是我们从事革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战场。我们不能撤出，而是要挺进！寒涛同志，我这个再度回沪的‘刘郎’，能不能给你一点

启示呀?!”

听着听着，钱寒涛不觉精神抖擞，被对方充满感情的谈话激动了起来。于是，马上接着说：“那好，我会坚守住的!我一定会比过去更坚决战斗的!”

“请你记住，寒涛同志，你在《大公报》并不孤立，我们的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，到处都有我们自己的同志，你随时会得到自己同志的帮助的。”

钱寒涛仔细品味着这些话，似乎又明白一些东西。他很兴奋。他们谈完了话，当钱寒涛要站起来告别时，却见对方先已叫着小许进来，并告诉寒涛，先让他一人离开这座别墅，然后再让寒涛和小许乘小车返回市区。

.....

钱寒涛坐在车里，他今后的联络员小许坐在他的旁边。绿色的雪佛莱迅速地驶过了西郊，进入市区。在红绿灯闪烁处不远，小车突然在一处路边停了下来。小许熟练地把车门打开，钱寒涛随即从车上跳了下来。雪佛莱接着向前驶去，并在一个十字路口急剧地转了个弯向南驶去。随着汽车的鸣叫和街上嘈杂的喧嚣声，钱寒涛也立即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大上海繁华依旧，还是车水马龙，人流滚滚，喧闹不息……

.....

.....

钱寒涛回到了报馆爱多利亚路时，一身的轻松。这里离著名的自鸣钟不远，地处上海的繁华地段，但他们的宿舍却在另外一个地方。那里倒也十分的安静。

在离重庆时，《大公报》领导层就决定要争取在十一月一日在沪出版。现在《大公报》的牌子已经挂出。在重庆的许多记者编辑，都已乘船东下，来到了这个中国的大都市，准备在此创一番事业，其中许多当时中国的著名记者，如有名的两徐（徐盈子冈夫妇和徐铸成）和两高（高汾高集夫妇），还有常驻国外的特派记者，如肖乾和杨刚等一大批名流大笔杆，不少人已来到了上海或准备回到上海。报馆住房紧张，许多记者和编辑都只得自己设想解决住宿问题。钱寒涛在上海没有成家，现在就借住在原来属于法租界的环龙路上，这里原是一个编文学刊物的作家居住的。现在房子的底层是这个刊物的出版社及经理室与总编室；二层则住着他们自己的人员。由于钱寒涛过去与他们有些交往，他们就让出三楼给《大公报》的几个单身汉居住，这个刊物的两位作家，一下子就成为他们的二房东了。

钱寒涛回到住处时，正好他的隔壁同伴已在楼上。这是一个军事组的编辑。本来，他应留在重庆，等上海的《大公报》在沪出版后再来上海的。因为目前全国的政治、军事重心仍在陪都重庆。但他对雾重庆早已厌倦，当然，更重要的是因他早年曾恋过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，当时双方信誓旦旦，非对方不嫁不娶。后来抗战爆发，这位姓蔡的军事编辑离沪到汉，此位小姐也举家逃到了香港，自此天各一方，杳如黄鹤。香港沦陷后，他曾多方打听这位恋人的下落，但伊人不知何处，他只好经年相思，在山城整整叹息了七年。抗战胜利后，这位姓蔡的编辑多方打听，有人说她已回上海了，曾在街上见到过她，仍是孤身一人，似仍在恋守着昨日的恋人。这个消息确使他大大地兴奋了一阵，那沉睡在他心中多年的相思之梦，顷又延续开来。于是，他在抗战胜利后，就急急请命要回上海，先期到沪筹备出版事宜。谁知到沪后，方才得知，那位多情的小姐自和他分手后去到香港即一病不起，不久即抱恨终天，魂断香江了。由于这位姓蔡的和钱寒涛都是他乡之客，又在重庆共事多年，

因此共同语言不少，他们就相约在隔壁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了。这位蔡兄情场落魄，常叹自己是“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”，不想多去回味那失恋之苦，就常过来和钱寒涛相互聊聊。

钱寒涛从西郊回到报馆，又从报馆来到宿舍，已近中午时分，见到这位蔡之宗先生正在他自己的房里躺在一张沙发上，研究从重庆航寄来的《大公报》。这些天，钱寒涛常感到这蔡之宗喜欢发表一些有独到的军事见解和军事分析。他与美国陆军新闻处驻中国雇员非常接近，与英美几家新闻机构驻上海的记者也常有联系交往，所以消息颇为灵通。这时，他见到钱寒涛从外面回来，爱理不理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递给他一张条子。那是《大公报》的同仁李真奇给钱寒涛留下的。

“看来，这李真奇是决心要离开我们报社了。”蔡之宗冷冰冰地朝钱寒涛说了一句。原来这李真奇在前几天就征求过钱寒涛的意见，想约钱寒涛他们几个人离开《大公报》，办一个同仁刊物，专门报导社会消息和时事新闻。他在钱寒涛面前说了许多自己办刊物的好处，还秘密告诉他，他已通过一位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雇员，弄到了一个批条，接收了一个在近郊的日伪仓库。这个仓库外观破旧不堪，颇为荒凉，像是已很久没有人去过问了，但李真奇到了那里进去一看时，竟眼睛为之一亮，里面堆满了物资，仅布匹就拉了十多卡车。里面还有大量的食品、罐头。更使他高兴的是仓库里还有二辆卡车和两辆未曾用过的吉普。至于五金材料，则堆满了好几间房子。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，这原来是日寇侵华时驻沪陆战队的一个留守处。抗战末期陆战队被调离沪，这个仓库就被遗忘了，只剩下看守仓库的几名日军后勤人员仍驻守在那里。李真奇接收了这个仓库后，很快又利用美国新闻处一个官员的名义，向市政府申请登记了一个出版物，并定名为《社会时潮》，并把社址选在离《大公报》不远的福熙路上。李真奇已邀请钱寒涛多次了，约他一起参加《社会时潮》的筹备工作，这事蔡之宗是知情的。

“蔡先生意见如何？有否高见告我！”钱寒涛听蔡之宗并不热情的话，也不温不火地问了一句。其实，他从西郊听了地下党负责人的谈话后，早已下了决心。但他还是故意地问了一句，表示他很重视友人的意见。

“一个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，但关键的只有几步，甚至只有一步。这几步别人是不能负责的。只有傻瓜才会向你指东划西！”

“你用这种情绪和口气对待同事，不感到内疚吗？蔡先生！”钱寒涛也故意挑逗着对方说。

“相反，我感到欣慰和幸运。欣慰的是你把我当作知音；幸运的是我没有与你一同犯错误。因为所有的人，在仕途失意时，都会埋怨自己在迈出这关键几步时，悔恨自己的。”蔡之宗仍站在那里，颇像认真似的回答道。钱寒涛对他颇感兴趣，于是就开始进到了他的房内坐了下来，也用像他一样的口气，朝对方再逗了一句：

“也难怪你在与那位苦苦相恋的小姐，踏着那关键的几步时，缺乏旁人的智慧，使自己终生遗恨了！”

“不对！不是我缺乏旁人的智慧，而是她由于有旁人的误导，害了自己……”

蔡之宗由于钱寒涛触动了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显得有些不高兴。于是，钱寒涛就故意把话拉了回来：

“你在看什么？有什么新的新闻线索？”

“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，我有新闻线索能告诉你吗！如果你要知道我的新闻线索，最好去读我写的新闻报导，或者是新闻评论！可惜我们的《大公报》最近还没有出版，因此，有消息告诉你也无妨：目前我正在研究东北形势；当然你也在研究上海的现状。”蔡说。

“你有重大发现？我的蔡先生！”

“你看吧，这是我们《大公报》在重庆的社评《莫失尽人心！》这还是九月二十七日说的。我来念给你听听：‘近有京沪来者，说